

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特质

杨鸿宇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DOI

摘要: 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根植于儒家伦理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特质。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坚持道德优先,推崇“义重于利”的君子人格与“忠孝为本”的伦理规范,以此构建德治社会的理想蓝图。在世界观上,中国文化追求和谐平衡,通过“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寻求人与自然的稳定。在社会责任层面,中国文化蕴含“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这种群体本位的家国情怀在历史演进中转化为近代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最后,中国文化在文化形态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包容性,通过对内部区域文化及外部异质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创新,确立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关键词: 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念;儒家伦理

The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ic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e

Yang Hongyu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e are rooted in the Confucian ethical system, exhibiting a distinct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Chinese culture prioritizes morality, advocating the gentlemanly character of "righteousness over profit" and the ethical norm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s the foundation," thereby constructing an ideal blueprint for a society governed by virtue. In its worldview, Chinese culture pursues harmony and balance, seeking stabilit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rough the natural worldview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t the level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inese culture contains a transcendent consciousness of "taking the world as one's own responsibility," and this collectivist national sentiment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juvenation in modern times. Finally, Chinese culture demonstrates strong inclusiveness in its cultural forms, establishing the diverse yet unified and enduring vit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assimil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ternal regional cultures and external heterogeneous cultures.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Basic values; Confucian ethics

前言:

晚清变局下,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论。“体”的意思是主体,是指一套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与精神原则。“中体西用”就是要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于中国文化之基本观念之上。那么中国文化之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中国文化之基本观念就是儒家伦理。李泽厚先生曾将其特质界定为“乐感文化”。此种文化形态,植根于宗法农业社会的土壤,滋养出“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与“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相较于西方罪感文化中那种需经由痛苦挣扎、征服自我以皈依上帝的宗教超越,中国传统更倾向于一种现世的关怀。它以审美代宗教,关注人伦与自然的和谐。它崇尚实用理性,重经验而轻纯粹逻辑分析,主张情理交融、体用不二,它确信道德境界非天赐而系由后天修习养成。这种文化性格,

内蕴着一种求同存异的包容机制,善于在历史长河中消融、会通异质思想。本文根据这样的脉络,试论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特质。

一、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深层结构,肇端于三代礼乐,而定型于周秦之际的百家争鸣。此一“轴心时代”的突破,确立了华夏文明“大传统”的底色。其核心特质,在于确立了一种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在个人层面标举取义舍利的君子人格,在社会层面推崇尽忠尽孝的礼仪规范,在政治层面则追求以德化民的德治理想。儒家学说之所以能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进而型塑中国传统价值的基本骨架,究其肯綮,在于它并非悬空的理论构建,而是深植于“血缘亲情”这一人类最本能、最原初的生命纽带之上,故能产生一种绵延不绝、摄受人心的力量。

罗志田教授曾论及中国传统“崇让不崇争”之特质，诚为确论。尽管翻开二十四史，不乏权谋攘夺之实录，然此乃历史表象之“实然”，不足以否定文化价值上之“应然”。所谓“崇”，乃是指官方正统意识与社会深层心理所共同仰望的精神标准。这种对“让”的推崇，实基于儒家对义利之辨的深刻体认与对失序的忧虑。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即以义利判分治乱，谓：“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荀子《礼论》更进一步从人性欲求与资源匮乏的张力切入，指出先王制礼义之本意，即在以此界分定止，使“欲必不穷乎物”，从而在群体生活中达致一种动态的和谐。

质言之，中国传统之“崇让”，实乃儒家义利观的社会化投射，其载体即为“君子”。《白虎通义》释云：“君子者，道德之称。”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君子非无欲，然必以义制利，其恬淡寡欲、崇让不崇争的风范，正是德治秩序的人格基石。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虽以批判眼光视忠孝为宗法社会之遗存，然其言确也点出了儒家伦理的另一维——忠孝。百行孝为先，孝不仅是家庭伦理的起点，更被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汉初《孝经》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将孝视为贯通天人、连接死生的终极德行。孔子视孝为仁之本，实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离不开这一原点。

进而言之，儒家伦理不仅止步于家庭，更遵循一种由内向外的推衍逻辑。后世法儒把孝由善事父母，外推为敬长，更上升为忠君。如此，孝便由伦常情感转化为政治义务，董仲舒更将其固化为“三纲”之首的制度性约束。综观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作为个体安身立命的依据，还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德”始终占据着宰制性的地位。人之所以为人，国之所以为国，皆系于此一念之“德”，此即道德优先价值取向之真谛。

二、和谐平衡的世界观

中华先民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但中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农耕文明依然孕育出一种独特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先民，面对浩瀚苍穹，不曾像西方那般，将“天”视为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将其视为生命的终极归属。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随着农业文明的积淀，逐渐内化为中国文化中崇尚和谐的精神底色。中国地理环境虽然相对封闭，但幅员辽阔气候适宜，具有比较优越的农耕生产条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先民，出于生存的需要，与天地自然和睦相处。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愿望随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积淀成民族心理，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

在思想史上，儒道两家虽理路各异，但在天人关系上的看法却殊途同归。《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老子》说：“用人配天。”《庄子·齐物论》则宣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

论述表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旨在破除天人主客二分的对立。在儒家看来，天人合一意味着人格或者说道德的升华，也就是“内圣”。而在道家看来，“天人合一”则是人格的自然化。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文明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还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和人的身心的协调。这就是中国文明相较于西方文明更关心现实生活的原因。

这种宇宙观落实在社会实践层面，便化为“中庸”之道。如果说天人合一处理的是人与神（自然）的纵向关系，中庸则致力于社会内部横向关系的动态平衡。它并非乡愿式的折衷，而是在仁与礼、义与利、贫与富等二元张力中，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度”，以维持系统的稳定。这种对“稳”的推崇，源于农业定居生活安土重迁的心理积淀，亦造就了中国人温和渐进、厌恶极端的国民性格。正如罗志田教授所言，中国传统观念趋向渐进，主张温故知新，推崇滴水穿石的功夫。梁漱溟先生在比较文化类型时亦指出，相对于西方文化之“意欲向前”与印度文化之“意欲向后”，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持中调和”之路。此种“中庸”与“调和”，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和谐平衡的世界图景。

三、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

《礼记·礼运》中所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愿景，其实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中国先人对于大同之世的追求。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本偏于群体论”。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念中的群体意识，或者说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在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灭国灭种之时，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就变成了爱国情怀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降至晚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神器沉沦，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然则，正是此种传统的经世精神与忧患意识，在危局中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现代转化。它从一种原本指向“天下”的文化普世主义，转捩为一种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成为支撑国族生存的精神磐石。

试观这一精神谱系之流变：明清之际，顾炎武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以此区分亡国与亡天下，及至近代之初，伴随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情怀，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智识，皆是此种经世传统在应对外侮时的激越回响。维新派之呼号“保国、保教、保种”，革命派孙中山之誓言“振兴中华”，乃至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沉痛独白，无不昭示着传统士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担当，已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与牺牲精神。

尤值得注意的是，伴随这一精神转化的“国家”观念的重构。古人说的天下就是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了近代，士人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夷狄观，形成了近代意

义上的国家观。如杨度所论,今日之中国,乃合二十一行省与蒙、回、藏等域为其土地,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其人民。孙中山先生后来倡导的“五族共和”,实即在此基础上,将传统的天下大同理想,重构为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架构。

四、强大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至今,不仅由于其本身的深厚,更由于其拥有一种强大的包容性。纵观世界古文明,大多盛极而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仅有中国未曾中断,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屡遭不同文明的冲击和内乱的摧折,却总能做到“分久必合”,在每一次危机中得以再造中国。而这种顽强生命力的根本就是中国文化有着“和而不同”的强大包容性,使其在不同区域或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中,得以顽强发展。

事实上,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产物。上古之时,代表“西系”的仰韶文化和代表“东系”的龙山文化就在此交汇,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而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文化,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相互交流,最终在秦汉形成以齐鲁文化为核心汉文化。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五胡乱华之乱,但最终也促进了中华南北文化以及多民族的交汇与融合。北族豪强将游牧民族的刚健质朴与畜牧技艺注入中原,汉族则以深厚的农耕文明与典章制度加以融塑,这种南北文化的深度“涵化”,反为隋唐盛世之开启蓄积了勃勃生机。

对于境外异质文化,中华文化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两汉之际,佛教东渐,隋唐时期极度繁盛,然而印度佛教却并未取代中国本土文化,反而在数百年的磨合中逐渐中国化。它与儒、道二家互相交融,共同发展,弥补了中国士大夫在形而上学与宗教意义层面的缺憾,并最终内化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步入近代,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倒性冲击,传统士大夫虽有“天朝上国”的心理滞距,但在“师夷长技”的理性认知下,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未完全拒斥。这种在固守根本中寻求“通变”的态度,昭示了中国文化在面对异己时,始终保有一

种开放吸纳、化他为己的从容气度。

结语:

概言之,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无论是从“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到“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还是从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担当,到文明本体“海纳百川”的包容气象,都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稳定结构。这一价值系统不仅在历史上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使其在面对异质文化冲击时能够完成自我更新,更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内在支撑。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审视并从学理上把握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对于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而言,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 [1] (宋) 邵雍. 邵雍全集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2] (清) 陈立. 白虎通疏证 [M]. 中华书局, 1994.
- [3] (清) 张之洞. 劝学篇 [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4]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M]. 三联书店, 2008.
- [5]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M].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6] 陈戌国. 四书五经 [M]. 岳麓书社, 2023.
- [7]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M].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8] 刘晴波主编. 杨度集 [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9]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M]. 中华书局, 1989.
- [10] 贺麟. 文化与人生 [M]. 商务印书馆, 1988.
- [11] 余英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M], 三联书店, 2005.
- [12] 张灏.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13] 罗志田. 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J]. 近代史研究, 1995(03):1-23.

作者简介: 杨鸿宇 (2000.5-), 男, 汉族, 四川绵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